

文献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丛书



唐五代笔记考论

严杰 著

066

中华书局

K242.066
Y050

文献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丛书

唐五代笔记考论

严杰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五代笔记考论 / 严杰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4

(文献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101 - 06605 - 0

I. 唐… II. 严… III. ①笔记—研究—中国—唐代
②笔记—研究—中国—五代(907~960) IV. Z42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0739 号

书 名 唐五代笔记考论

著 者 严 杰

丛 书 名 文献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丛书

责任编辑 罗华彤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9 $\frac{3}{4}$ 插页 2 字数 15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6605 - 0

定 价 25.00 元

“985 工程”二期“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资助成果

“211 工程”三期“中国语言文学与民族文化
复兴”项目资助成果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专刊

文献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丛书

总 序

程章灿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古典文献对中国文化传承的贡献是全方位的。它不仅以一种相对集中而凝固的方式保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而且通过传抄、印刷、编辑、整理、诵读、研究等传播方式,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而参预了对中国人的心理情感和思想文化内涵的塑造,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在文献传承的过程中,不仅各个学科领域和各种不同类型的具体文献的传承,参预了对中国文化之民族特色的塑造,并影响了中国人对自身心理情感与思想文化的民族认同;而且,作为文献著录和书籍传承的重要支撑的目录学,也一贯致力于整合林林总总的固有文献与已有知识,使之系统化与合理化,与此同时,其自身还构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与学术框架。有鉴于此,几年前,当南京大学文学院(当时的南京大学中文系)正式实施国家“985工程”“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研究计划时,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和古典文献研究所的同人们集思广益,提出以“文献传承与民族文化认同研究”为名设立子课题,并很快通过了专家组的立项论证。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文献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丛书”,就是这一子课题的研究成果。

显然,在设计这个子课题时,我们主要着眼于其理论框架的建构与宏观思路的拓展,力图从大处着眼,以开拓我们的思维。但是,在这项研究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到,只有针对具体的对象和确定的问题展开学术研究,运用多年的学术积累,发挥自身的学术优势,才能真正推动这一领域的学术进展,不管这些进展是理论方法的创新,还是文献史料的丰富,或是对具体问题研讨的深入。因此,我们决定从专题研究入手,对各项历史文献展开整理、解读和阐释,不避小题,以避免不切实际的蹈空议论。也可以说,我们的宗旨就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我们相信,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文献进行的整理与研究,可以构筑坚实的工作基

础,搭建良好的阐释平台,进而深入探究中华民族在某一时代或某一方面基于心理情感以及思想文化基础之上的民族文化认同;同时,研究作为文献传承的知识支撑系统的目录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也有助于追踪中国文献、知识以及学术思想框架形成的过程及其特殊性。另一方面,我们既注重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的传世文献、儒家正统文献以及域内文献的传承研究,又重视对出土文献、非儒家文献以及域外文献的传承研究。关注这些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文献,当然意味着文献视野的进一步开阔,但更重要的是,从新的文献视野中,也有可能发展出观察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新眼光。

具体说来,这套丛书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以目录学及其历史发展为核心,探讨富有中国特色的文献、知识以及学术文化框架渐次形成的过程及其特质,最终叩问中华民族文化之特质。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其名著《校雠通义·自叙》中早就说过,“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近代文献学家余嘉锡先生在《目录学发微》中更明确指出:“目录者,学术之史也。”徐有富长期致力于目录学研究,其《目录学与学术史》一书,择取《汉书·艺文志》、《七录》、《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元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等目录学名著,从文献聚散、类别分离、序跋评说等方面入手,辨析古代学术各门类的兴衰分合,从中觐见中国学术思想的起伏变迁与学术发展的大趋势。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体系中,经学无疑占有首要地位,相关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经学目录在目录学中也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长达三百卷的朱彝尊《经义考》是清初最重要的经学目录著作。它从目录学角度,对清初以前的经学著述之目及其分类、存亡、阙佚等情况详加考述,“源委详明,足称博赡”,可称是一部集大成的经学目录。另一方面,作为朱彝尊“穷一生之力”完成的私家著作,《经义考》所建立的经学目录的新体系,在经学学术史上亦自具承先启后的意义。张宗友《〈经义考〉研究》一书,从文献著录与学术承传的角度对这一部专书条分缕析,论列甚详。

第二,以书院研究为中心,探讨书院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对文化传承的作用。正如《书院与文化传承》一书编者所强调的,“对书院史研究的重视,并不是在单纯保存文化记忆,而是在教育体制发展的背景下,在传统中寻找可供转化的精神资源”。这是众多书院研究者共同的人文关怀,也是编选这本论文集的特别动机之一。从官学与私学的关系来

说,书院显然属于私学。在一定意义上,研究书院与研究私家书目颇为类似。研究私家书目,就是探讨中国传统目录学形成过程中有别并且独立于正统官修目录之外的另一个目录传统;研究私家书目与官修目录如何互动,就是探讨民间学术如何与官方学术相互影响,以及不同知识学术体系如何融合组成传统知识文化体系,并影响后代中国人的知识文化系统的构建等问题。在这套丛书中,《书院与文化遗产》有些与众不同。作为一部论文集,它既荟萃了包括胡适、聂崇岐、邓之诚、瞿宣颖等前辈学者在内的重要论文,又选录了近年学者的研究心得;而它的编者卞孝萱和徐雁平也同样属于两代学者——它从两个方面象征了学术文化的薪火传承。

第三,从那些通常不太为人重视的文献入手,挖掘一些曾经受到忽略甚至被长期埋没的学术问题,探究这些文献中新的学术文化蕴涵。石刻文献、笔记小说文献、域外汉籍文献,都是以往研究中不大为人重视的。虽然从宋代以来,金石学便已成为一种专门之学,但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世风和学风的转变,关注石刻文献的人越来越少,特别是对那些传世石刻文献,很多人似乎把它们遗忘了。实际上,不仅二十世纪新出土的石刻值得研究者注意,传世石刻中也仍然有许多意义空间有待开掘,有许多学术问题有待探索。《古刻新诠》是作者近十多年来所撰石学研究论文的结集。书名中所谓“古刻”,既包括传世石刻,也包括新出土的石刻。书名中标明“新诠”,意在强调这两类石刻都有重新诠释的必要和前景,这也正是文化遗产的题中应有之义。书中考释涉及文学、语言、史学、艺术等领域,说明这种诠释正不必划地自限。严杰《唐五代笔记考论》实际上也可以改题“古稗新探”。作者潜心研治唐五代笔记小说二十余年,对笔记小说的概念、范围、唐五代笔记传承情况及其文化价值都有独到见解,对与此相关的正史与笔记、事实与虚构、当世记录与后代修饰等重要问题亦有深切理解。本书分上、中、下三编,包括总论、述要与具体考述三个部分,面、线、点相结合,考论相兼,无论是全局描述,还是微观考证,对于唐五代小说、历史及文化研究,都有重要参考价值。要深入理解文献的意义,不仅需要了解文献自身的形成及其传承过程,也需要参考和借鉴前人的研究积累。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小说研究基本上不登大雅之堂,二十世纪以降,小说研究才“升格为一门具有现代学科性质的专学,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收获,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区别于传统学术的特色与个性之所在”。这一份丰厚的学术遗产应该及时清理,其中的利弊得失亦有待总结。苗怀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献学述略》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研究分为四个时期:二十世纪上半期、建国后三十年、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从小说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等方面,对这一学术领域的成果作了全面盘点,尤其突出有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名著的文献。小说的产生、存在、传播的社会文化语境与诗文辞赋等文学样式有很大差异,小说研究也相应地形成了自身的特点,苗著从学术史角度所作的文献清理,显然有助于这两方面的正本清源。

对域外汉籍文献的重视,是本丛书的一个特色。《古刻新诠》中有长文考释《大越国李家第四帝崇善延龄塔碑》。巩本栋《宋集传播考论》也十分重视域外所存的宋代文学史料,并以相当可观的篇幅论述宋集撰述流传高丽、朝鲜两朝的情况。金程宇《稀见唐宋文献丛考》更是致力于发掘日本、韩国所藏唐宋文献,并利用域外访获的资料对中国固有文献进行订补,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有《帝王略论》、《李元宾文集》、《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等多种。另一方面,作者还从出土文物以及法帖、墨迹等传世文物中,发掘并整理出一批珍贵的唐宋文献。如果说文物是以另一种物质形态出现的文献,那么,域外汉籍则是在另一种文化环境生存的文献。如果说文物指向的是物质文化与典籍文化的复杂联系,那么,汉籍在域外的承传,则往往是中国文化与周边国家文化密切关系的见证。

第四,对宋代文献的研究是本丛书的重点之一。这不是偶然的。在中国文献传承史上,宋代是由抄本时代真正进入刻本时代的转折点。无疑,刻本时代的到来对文献传承和文化繁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宋集的刊刻和流传,无论就其外部条件还是就其质量及数量而言,都远胜前代。《宋集传播考论》从宋集的编辑、刊刻、流传以及明清人对宋集的整理等方面,对宋集的传播作了全面论述。宋代文学是宋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宋集是宋代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宋集的传播也就是宋文化的传播。在宋集之中,诗选颇为引人注目。宋人尤其是南宋人好讲学,好议论,也好选诗、评诗,加上刚迎来刻本时代,南宋诗歌选本盛极一时。甄选前代或当代的诗歌,甚或加以评说,这本身就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介入文献传承的行为,而其成果便转化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文献。这些文献承载了当时人的诗学观念,承载了后人对前代诗歌文化的理解,记录了后人对再后人的影响痕迹,尽管其后来或存、或残、或佚,但通过对这些文献遗存的清理,我们观察南宋诗学之时,就可以占据一个更好的文献传承的视点。卞东波《南宋诗选与宋代诗学考论》中重点考论的八种南宋诗选以及其他二十多种诗选,在这一方面的意义不容小觑。与前两种著作不同,孙立尧《宋代史论研究》则以史论文献的整理与阐述

为中心。“宋代是中国史学的颠峰,而史论正好契合了宋代的文学、史学、经学与理学等诸多学术问题。”史论据史事而发,集中体现当时人对历史的理解与利用;又依经立论,深受宋代理学思想的影响;作为一种论说文体,其文章又呈现出文学化的诸多趋向。夸大一点说,宋代史论是一种跨越经、史、子、集四部的文体,遗憾的是,以往学者对此类文献关注甚少。孙著不仅有对两宋史论发展的线性描述,对史论的文学化与理学化也有颇为深入的剖析,很值得一读。

这套丛书的作者和编者,目前都供职于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和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多年以来,他们精诚合作,凝聚成了一个团结奋进的集体。这个集体的成员们坚持将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学风,初步形成了自身的特色。本丛书就是部分团队成员的集体展示。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作者队伍中,既有寿逾耄耋而老当益壮的卞孝萱先生,也有年富力强的中年学人,还有年方而立的后起之秀。当然,读者们也不难看出,丛书中有少量成果是在课题开始之前完成的,这说明我们一贯的研究方向与这一课题旨趣不谋而合。整理典籍,阐释国故,发古典之新义,阐旧邦之新命,这是文献传承的核心内涵,也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也许我们做得不够好,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

目 录

引 言	1
-----------	---

上 编

“笔记”与“小说”概念的目录学探讨	5
唐代笔记对国史的利用	16
唐代笔记的娱乐性	28
唐代笔记的撰者因素	44

中 编

唐五代笔记述要	55
---------------	----

下 编

《朝野金载》考	107
《大唐传载》考	117
《明皇杂录》考	123
《因话录》考	130
《玉泉子》考	135
唐代宰相“会食”考	140
唐五代笔记索引	145
后 记	147

引言

研究唐五代笔记,有助于推进对唐五代小说的全面研究,此为有识者所知。

唐五代笔记的最大价值更在于其史料价值。此指广义之史料价值,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社会生活等等,可谓包罗万象。宋人编纂《新唐书》、《资治通鉴》,取材于唐五代笔记甚多。对当今学者来说,发掘唐五代笔记的史料价值,可以拓展唐代文史研究。在这方面,已有前辈学者的榜样。康輶《剧谈录》卷下记载:

元和中,进士李贺善为歌篇。韩文公深所知重,于缙绅之间每加延誉,由此声华籍甚。时元相国稹年老,以明经擢第,亦攻篇什,常愿交结于贺。一日,执贽造门,贺览刺不容,遽令仆者谓曰:“明经擢第,何事来看李贺?”相国无复致情,惭愤而退。其后左拾遗制策登科,日当要路。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父名晋,不合应进士举。贺亦以轻薄为时辈所排,遂致轹轳。文公惜其才,为著《讳辨》明之,然竟不成事。

元稹见李贺之事不实,后人多有辨正,则此说无史料价值。然而陈寅恪先生独具眼光,指出:

剧谈录所记多所疏误,自不待论。但据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见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之情状,故以通性之真实言之,仍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也。^①

^①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84页。

2 唐五代笔记考论

“通性之真实”的提出,揭示了对史料价值的深层次发掘,具有方法论意义。此后,严耕望先生曾撰《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一文,采用唐五代笔记颇多,文末附记曰:

本文取材,颇多唐五代笔记小说家言。此类记事或不无失实之处;然本文主旨不在考证个别事项之准确性,而在阐明当时社会之一般风尚。稗官所记容有失实,然仍足反映当时社会风气,此无可否认者,故取之不碍。^①

可见此文实际上以求“通性之真实”为指导,充分运用笔记中的史料以说明社会风尚,取得成功。

唐五代笔记的记载固然不免谬误,然而亦多有可纠正补充正史疏失之处,借助笔记材料进行考订,可以获得具体之真实。如果笔记不能提供具体之真实,则通过深层次发掘,往往可以获得通性之真实。在使用笔记时,通过较为生动有趣的文字,了解真实的历史,这过程本身也使学术研究多了些趣味。

^①《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载《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中华书局,2006年,第271页。

上 编



“笔记”与“小说”概念的目录学探讨

进行笔记研究,有必要对其概念加以讨论。这也算是“正名”之举。

“笔记”这一名称,起于六朝。《南齐书·丘巨源传》载其所言:“议者必谓笔记贱伎,非杀活所待;开劝小说,非否判所寄。”在这段话中,“笔记”与“小说”恰巧同时出现,但是都不指文体。丘巨源当时“于中书省撰符檄”,此处“笔记”指执笔记录,起草文书;“小说”指琐屑的言谈。梁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传》云:“辞赋极其清深,笔记尤尽典实。”^①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云:“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又云:“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所言“笔记”亦皆指执笔记录,起草文书。六朝时,笔记常称为“笔”,与“文”相对,如《南史·颜延之传》记其云诸子中“竣得臣笔,测得臣文。”此处“笔”亦指文书。《文心雕龙·总术》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此处将非韵文之“笔”与辞赋等韵文相对,则是声律之说兴起后的看法。此后,渐渐把随笔而记录见闻杂说的文字称为笔记,将这样的文字汇集起来则是笔记著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笔记著作的产生还早于六朝,而作为书名则始于北宋宋祁的《笔记》三卷。

“笔记”的概念形成较迟,而且近于原先的“小说”概念,古人通常将笔记纳入小说的范畴。因此,论古代笔记不能不论“小说”,应将二者结合起来讨论。

讨论之前,不得不申明,古今“小说”的概念差别极大,不能简单等同。

早期的“小说”概念核心在“小”在“杂”

关于早期的“小说”概念,学者最常引用者有三处:一是《庄子·外

^①《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五二。

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小说”一词，应是始见于此，指远离大道的浅薄言论。二是《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序：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

如淳注曰：“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汉书·艺文志》以“街谈巷语，道听涂说”给“小说家”下定义，评价很低，不比《庄子·外物》谈到“小说”时的鄙夷态度好多少，只是引孔子的观点认为有可观者，予以一席之地。三是桓谭《新论》中所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①这与《汉书·艺文志》的评价相似。《汉书·艺文志》源于刘歆《七略》，刘歆、班固对“小说”的定义在古代具有权威性，后世大抵承其观念，对“小说”评价很低，同时也认为稍有一些价值。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类著录《伊尹说》等十五家，其书早已亡佚，至《隋书·经籍志》皆不见于著录。这十五家的性质，根据其书名与班固自注，可知其内容或近诸子，或近史书，或讲方术，极为驳杂。明代胡应麟认为：“《汉·艺文志》所谓小说，虽曰街谈巷语，实与后世博物、志怪等书迥别，盖亦杂家者流，稍错以事耳。”^②言之有理，当《汉书·艺文志》问世之时，尚未有书籍整体上稍具现代意义的小说成分，小说家与杂家相去不远。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惟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③可见诸书在子、史范围内，近子、近史而又不够相近部类的标准。《汉书·艺文志》将小说家列入诸子略，虽有贬词，仍以学术性质视之，其根本当以言说见长，而“街谈巷语，道听涂说”中的传闻则有可能含有历史事实，或是有故事性。后世将不本经典的论述、不纯正的史书、随笔而记言记事的杂著都称作“小说”或“说部”等，范围基本上也在史部、子部内。

①《文选》卷三一江淹《杂体诗·拟李都尉从军》李善注引。

②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九流绪论下》。

③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3页。

《隋书·经籍志》对魏晋以来初步形成的图书四部分类法加以确立,其子部小说类沿用《汉书·艺文志》的标准,所收书二十五部,也很驳杂。《杂语》、《杂对话》,这样的书名已显现其“说”之“小”之“杂”。至于《燕丹子》记历史传说,邯郸淳《笑林》、刘义庆《世说》、殷芸《小说》等大抵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辅,今人研究小说时通常都看作古小说,而其中殷芸《小说》则应是以“小说”命名书籍之始。以今人的眼光来看《隋志》小说类所著录,现代意义的小说成分已大于《汉志》小说家类所著录。《古今艺术》等末七部,则性质有异,对这些书顾名思义,依照后世书目的标准,一般应归属子部艺术类,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对此曾指出:“皆艺术之流,大抵因《汉志》小说家有‘小道可观’之语,遂杂入之此类。”“本志不立艺术类,故附著于小说、兵家二类。”^①在末七部书中,著录后魏丞相士曹行参军信都芳撰《器准图》三卷,此可与经部乐类所著录信都芳《乐书》七卷一并考察。《魏书·术艺传》载信都芳小传曰:“好学善天文算数,甚为安丰王延明所知。延明家有群书,欲抄集五经算事为《五经宗》,及古今乐事为《乐书》,又聚浑天、欹器、地动、铜乌漏刻、候风诸巧事,并图画为《器准》。并令芳算之。会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魏书·元延明传》亦曰:“又以河间人信都芳工算术,引之在馆。其撰古今乐事,《九章》十二图,又集《器准》九篇,芳别为之注,皆行于世。”集古今乐事之《乐书》可入经部乐类,《器准图》有关天文算数,属术艺工巧之书,而《魏书·术艺传序》云“盖小道必有可观”,则“小道”之书列入小说类也算是变通合宜的做法。后来,《新唐书·艺文志》将信都芳《器准》三卷列入子部历算类,符合实际。

综合上述,从《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到唐初编纂的《隋书·经籍志》小说类,“小说”的概念近于后起的“笔记”,“小”之外又具有“杂”的特点。

早期书目中小说类尚有空间可待拓展

《隋书·经籍志》小说类的著录范围虽然很杂,但若与后世重要书目中的小说类或小说家类相比,则尚有空间留待拓展。

从今人研究古小说的角度来看,《隋书·经籍志》小说类著录的《世说新语》等书可称为志人小说,而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另一大类志怪小说在《隋志》中主要归入史部杂传类,其小序曰:“古之史官,必广其所记,非独

^①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二,《二十五史补编》本,中华书局,1955年。